

天津当代诗五家论

王士强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天津当代诗五家论

王士强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津当代诗五家论 / 王士强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9
ISBN 978-7-02-015411-1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歌研究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54940 号

责任编辑 于 敏
装帧设计 黄云香
责任印制 任 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60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 插页 3
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5411-1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王士强，山东临沂人，1979年生。文学博士，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，供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、《诗探索》理论卷特约编辑。天津市宣传文化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、天津社会科学院“青年科研骨干”。出版《烛火与星光》《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——新世纪诗歌勘察》等，曾获“澄迈·诗探索奖”理论批评奖、“中国当代诗歌奖”批评奖等。

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天津当代诗歌论”(TJZW11-003)成果

天津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补贴项目

天津市宣传文化“五个一批”人才建设资助

目 录

绪 论	天津当代诗歌的地位、特质及代表性人物	…	001
第一章	鲁藜：“泥土”精神与“人民”立场	…	019
第一节	三四十年代：“泥土”诗人的形成	…	021
第二节	“新中国”成立初期：汇入时代的合唱	…	030
第三节	“新时期”：重新出发与新的探索	…	034
第四节	宏大与空疏：“理念化”诗歌的特点及反思	…	046
第二章	穆旦：从忐忑不宁到心无挂碍	…	051
第一节	作为背景：三四十年代的创作	…	052
第二节	1957年短暂的诗歌“复出”	…	065
第三节	1976年：从疾病与孤独重新出发	…	080
第四节	“真正的自我”与永恒的忧伤	…	085
第五节	异质性、未完成的可能性	…	110
第三章	伊蕾：这一个自由的灵魂	…	121
第一节	抒情性与浪漫主义特征	…	123

第二节	紧张感、挣扎与挣脱	132
第三节	“女性”，而不“主义”	140
第四节	“为自由而生，为自由而死”	151
第四章	徐江：一意且孤行	161
第一节	有感而发、言之有物、抒情性	162
第二节	反乌托邦、口语、“民间写作”	171
第三节	一个人“与/的”世界： “杂事诗”/“花火集”	176
第四节	《葵》：“现代诗”的推助者与集散地	187
第五节	“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”	198
第五章	朵渔：诗歌的重量	208
第一节	从身体出发	210
第二节	对时代现实的关切	217
第三节	直面内心的深渊	225
第四节	诗学追求与探索的移步换形	233
第五节	“民间知识分子写作”的立场	241
后 记	247

绪 论

天津当代诗歌的地位、特质及代表性人物

—

在迄今约百年的中国新诗历史上,天津或许算不上一个具有策源性、吸附性的中心区域,它缺少如京沪吸引各地优秀人才于一处的客观条件,也没有扮演过如巴蜀“揭竿而起”、引领风气之先的革命者角色,总体而言是比较平稳、不显山不露水的。但这并不代表它不重要,实际上,近百年来天津在中国新诗的探索与发展中从未缺席,涌现出了许多诗人与大量诗作,在低调、沉潜中为中国新诗、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不可或缺贡献。

在新文学草创到新中国成立约三十年的时间里,天津的新诗活动与创作已较为活跃。这一时期天津的文学媒介比较发达——比如《大公报·文学》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

《大公报·诗刊》《益世报·语林》《益世报·文学》等的存在——为天津的文学、诗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便利的条件。与此同时天津也出现了许多新文学社团,如绿波社、现代文学社、海风社、野草文艺社、人生与文学社、天下篇社、文地社、三山文艺社等,他们自办的刊物《当代文学》《诗歌小品》《诗歌月报》《人生与文学》等曾拥有广泛的读者群,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从人员来看,邵冠祥、曹镇华、白莹、潘漠华、简戎、孟英、栗曼晴等作为天津本地或者外埠来津诗人,其创作均显示了一定的实力与个性。

新中国成立,文学进入“当代”时期,天津的新诗也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并具有可观的创作实绩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天津诗人既有解放区来津的如鲁藜、阿垅、孙犁、芦甸、方纪、劳荣等,也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柴德森、闵人、陈茂欣、冯景元等。鲁藜除诗人身份外还担任了建国初期“文协”的领导职务以及进入“新时期”之后文联、作协的领导职务,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当然还有1953年自美归国的穆旦,他此后长期生活、工作于天津,“当代”的穆旦尤其以1976年创作的二十余首诗而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。新中国成立后诸如“反右”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对新诗发展造成严重影响,许多诗人的创作活力受到严重压抑,这种状况到“新时期”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观和释放。“新时期”以来的1980、1990年

代,天津诗歌呈现出繁荣、多元的发展态势,林希、伊蕾、许向诚、颜廷奎、宋曙光、王向峰、徐江、萧沉、刘功业、田晓菲等都以独创性、个性化的风格而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到21世纪以来的消费社会、网络时代语境之中,诗人群体尤显庞大,诗歌的活力与创造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,这一时期朵渔、君儿、李伟、图雅、罗广才、段光安、马知遥、季晓涓、岳兵、徐柏坚、王彦明、沈遇、鬼狼等都较具活力,体现了各不相同的诗歌追求与特色。近些年天津诗歌发展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几种诗歌民间刊物的存在,比如以徐江为核心的《葵》,比如朵渔主编的《诗歌现场》,比如由罗广才主编、近年有较大影响的《天津诗人》(该刊虽系出版社公开出版,但编选理念、运作方式、资金来源等都是民间的),前两者追求美学上的一致性与纯粹性,后者则体现美学上的包容与多元。这三种刊物各有所长,但都具有较大的影响,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天津的“诗歌名片”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就当前的诗歌创作成就与水准而言,天津在全国的版图中至少可以说是不容小觑的,是可以与其他的兄弟区域相比拼、抗衡的,对于从地理版图来说并不大、政治与文化资源配置也不显要的天津来说,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已非常难能可贵。

二

进入新时期尤其是近年以来,城市书写、都市意象在天津诗歌中较为独特,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,值得进行专门的观照。中国新诗与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,迄今约百年的新诗,其发生、发展是与现代中国巨大而艰难的历史转型相同步的。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“现代化”时期,这其中很重要的便是城市化、工业化、商业化,城市不但是各种资源集聚的中心,也是文化与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归。对于农业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、积重难返的“乡土中国”来说,在现代化、全球化的背景下,城市作为一种凝聚性和成长性因素,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。此种情形,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在《文化转向》中所说:“今天的世界体制趋向于一种庞大的城市体制——倾向于更全面的现代化趋势”,“城市改变了整个社会”,乡村“商品化”,农业也“资本化”了。就中国新诗中的城市书写而言,自新诗诞生之初到当下产生了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,城市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想象,有的歌颂“力之美”,有的诅咒“恶之花”,有的视之为罪恶的渊藪,有的将其看做是欲望的天堂,有的自认是无根的飘蓬匆匆的过客,有的则如鱼得水乐以忘忧,如此等等,折射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认同。就

天津而言,在城市诗的书写领域,天津与更具符号化意义的北京、上海相比或许显得特色不太鲜明,但由于其自身文化发展和城市定位的独特性,仍然呈现了一些自身的特质。天津的城市诗书写在“现代文学”时期基本是零星发生的,总量不多,而且主要是泛泛地谈论都市、城市,很难说能构成独立的审美对象。这一现象在“当代”尤其是“新时期”有所改变。在“新时期”,诗歌的生产力显然得到了极大的解放,“城市”作为现代化的载体,受到越来越多诗人的观照和书写。

天津在“新时期”的“改革文学”大潮中成就较高,出现了如蒋子龙这样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作家,而在诗歌领域,同样有类似的探索,当时被并称为“蒋冯”的冯景元便是一例。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前期,冯景元写作了大量的工业题材诗歌尤其是“钢铁诗”,并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重要报刊上发表,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冯景元的这类诗大多激情澎湃、热情洋溢,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红火景象,有着粗犷、豪放、大气、阳刚的风格。在这里,工业、钢铁无疑是对于城市和社会生活的描述与认同,也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想象。步入“拨乱反正”“改革开放”轨道的中国,燃起了对于现代化的巨大热情,而经济建设、工业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,高楼大厦、人头攒动、激情满怀、高歌猛进成为人们对于现代生活、

城市生活的一种典型认知。与冯景元类似,诗人白金这一时期也写作了大量的工业诗歌、工厂抒情诗,并结成专集《五月原野》《爱的呼唤》等。白金的这些诗主要是反映新时代,歌颂建设者,同样表达了奋起直追、阔步前进的时代性情绪,如其诗歌《天职》所写:“绝不能再盲从那些空头政治,/不能再容骄夫,惰子,白痴。/什么是我们铸铁工人的天职?/火,让生命之火在宇宙飞驰。”这里面显然有一种现代性的焦虑,而这种焦虑同样反映了出现变革的可能性、重获“自由”的喜悦之情。就这一时期诗歌中的城市想象而言,城市主要是一种正面的、作为精神归属和价值依托的文化空间,它更多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,这也是与1980年代前期国人对现代性的单向度向往与追求的时代“共名”相一致的。

“新时期”文学的确经历了一个如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所说的从“共名”到“无名”的过程,简单地说,是发生了一个由主题突出、特色明显到价值多元、共生共存的转变。就天津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而言同样如此,“新时期”之初是现代化之旅的“重新出发”,这一时期人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单纯而热情的想象,“城市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,代表了发展的方向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现代化”本身也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,人们此前的乐观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某种盲目性,这时,对“现代化”

的反思便会随之出现。此外,对“现代性”的反思本身也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,这种反思无疑会赋予现代性书写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视角。故而,关于城市的书写在更为晚近、更为年轻的写作者那里,呈现了更多的向度和更复杂的内涵。如果说此前对城市文明的歌颂、向往是一种“主流”的话,那么现在则发生了逆转,主要是以对城市文明的怀疑、批判、疏离为主了。王丽华的组诗《三代人的春天》写了外公、父亲、“我”三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,“城市”代表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但是,城市同样是一座围城,而今,“城市接纳了我,我仍感到孤单/夕阳照在城市宽阔的马路上/我却找不到可以喘息的瞬间”,“在这里发芽,却不能在这里生根开花”,这种感受应该说是很有普遍性的。而在朱春生的《骑牛走过城市》中,直接写到了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撞,这里面有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,但更深层的则是一种黑色幽默与无可奈何。在更年轻的写作者那里,城市则呈现了一种多元并置、后现代主义的景象。如冯芦东的《八号精神病院》:“502 的房门没有关,深度镜片后面的鼠眼/用余光咀嚼闪电,拖着长长的尾巴和USB 接口/扫视病毒和乱码,你提醒他/那个健忘的中年男子,在电流经过躯体时/发出狂躁的震颤,以及设置在路口的警示灯/有很多身影慌忙地躲闪,纸团和冰雹破窗而入/过期的报纸遮住熟睡的面孔,在五楼的阳台上/和散步的猫

撞个满怀”；而在女诗人沈遇的《凶手在隔壁》中，城市则显得如此锐利、冷漠：“消防员救出火灾烧毁全身皮肤的女孩/卖建筑材料的李先生也住在隔壁/有个学生没有带准考证，他跳楼死掉了/他也在隔壁，不过是新闻的隔壁。”诗中写一栋楼所住的“隔壁”有着各不相同的工作，他们中有的卖甲醛超标的家具，有的贩卖以毒饲料饲喂的鸡，有的运输质量低劣的建筑材料，这些人现实中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，但总体地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，同时又各自构成了互相加害的“凶手”，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书写既是写实的又是隐喻的，尖锐而富有见地。我们看到，这里的城市镜像，更多是一种欲望、消费、价值多元、去道德化、无深度、碎片化的城市，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，与“新时期”较早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

天津是一座有较深文化底蕴的城市，虽然在现代化的强势覆盖下，文化传统不可避免要受到冲击，许多的文化形态甚至面临灭绝。但在诗歌中，仍然有不少或隐或显对于天津文化的表达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薪尽火传的文化传承之功。这其中如闵人的《海河谣》、黄桂元的《哦，“五大道”》、鲍和平的《名河畅想》等，均是对某些天津“地标”的书写，这些地标既是地理、现实意义上的，也是文化意义上的，写出了天津这座城市更为内在的历史蕴涵和现实特征。此外，近年以来，天津城市定位的转变

和经济发展的加快,也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体现,比如许向诚的《保税区写意》《开发区纪实》、卢瑞生的《大港风》、胡元祥的《电杆颂》、孟宪福的《老海新歌》等。这样的书写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“主流”,在当今的文化生态中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大致而言,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,天津当代诗歌中的城市想象从早期比较单一的对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向往,到对城市的爱恨交织、复杂纠结,从前现代性、现代性到后现代性,从整体性、统一化到碎片化、去意义化,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,到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缅怀……经历了一个嬗变、弥散的过程,其内在是颇为复杂、丰富的。

近年来,天津诗歌关于城市的书写数量很多,体现出新的变化,其中较为明显的是都市意象和所呈现的空间美学。无疑,“现代化”仍然是当今时代中国的主题,现在——以及未来不短的时间之内——我们国家都会处于从“乡土中国”向“现代中国”转化的过程之中,城市化的比重将越来越高,城市人口将越来越多。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,关于现代化、现代性的想象在城市书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,诸多的工业化、商业化、城市空间、现代交通等意象大量出现。比如高柳的《工人》诗中“颤动的机器”意象:“换上工作服/脚步踩着太阳的鼓点/响到岗位/抚摸着颤动的机器/依如守候着爱人/滚烫的心跳”“一把焊枪把信念焊得很实/一台

车床把梦想车得很亮”“一双粗糙的手/把一种力量凝成歌曲”；比如黄宝平诗中的“港口”意象：“低空的云朵像簇簇白帆/天也蓝蓝,海也蓝蓝/在海天交汇处,你临风伫立/吞吐日月星辰,集散五洲云烟”；比如鲍和平的《名河畅想》中现代海河的意象：“一条包容四方的海河,/将随着天津的发展承载更多的使命;/一条风云际会的海河,/将是天津新的形象;/一条返老还童的海河,/将是拉动天津前进的绳缆”(《港口》)；比如温度诗中作为“现代化”与“远方”象征的“火车”意象：“坐上梦想的火车旅行/去北京 去西安 去上海,到每一个/有阳光的地方”“与她们,与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一起呼吸/并且一定要告诉她们的/我现在万分激动的幸福/我坐着蓝色的火车/从遥远的北方憧憬着 歌唱而来”(《蓝色的火车》)……这样的书写无疑是具有时代特征的,它表达了中国这样一个“后发现代性”国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与想象。这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主导方向,是文化发展所需要经历的阶段和所需要面对的对象。

当然,诗人们对于“现代化”的态度绝不是如此单一向度的,而是丰富、复杂甚至暧昧的,其中也包含了对其的反思、审视、忧虑。比如鬼狼笔下的“垃圾场”意象：“从楼顶望向不远处/垃圾场/一片片/白色/灰色/蓝色/红色/黄色/黑色/少年拾荒者的清晨/躬身/忙碌/嵌入泥土般/不知这世间最美的金黄/就要与他/擦肩而过”(《七彩垃圾场》),